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一種

# 凱恩斯時代

Robert Lebackman 著

楊 懿 負 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871

港台书室

546301

# 凱恩斯時代

The Age of Keynes



Robert Lekachman

著

楊淑貞

譯



90094685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二一種

# 凱 恩 斯 時 代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出版

原著者	Robert Lekachman	著
翻譯者	楊 淑	貞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灣銀 臺北市重慶南路	行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	

## 序　　言

繼大不列顛與美國經歷商業循環過程中顯然不可避免的不景氣階段已經又不只過了一個時代。對於大多數40歲以上的美國人及英國人而言，西元1929年至1933年的不景氣肇致了大量的失業，使工廠停頓，商店倒閉，抵押品贖取權遭否定以及社會大眾生活之悲慘與失望等情景，不僅僅是個人不愉快的回憶，或僅是未來生活的一項借鏡，而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變。「不景氣」(depression)這個字已經從一般字彙，而且也幾乎從職業經濟學家的專用字典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蕭條」(recession)。絕大多數人希望他們所遭遇的蕭條是短暫而溫和的一種，當然他們更希望這種蕭條不會經常發生。

我們總是以自己最近的經驗預期將來的生活。而且在我們的工作生涯中所希望享受的不外是持久的職業，定期的升遷、加薪、大房子、大汽車、長假期以及各種休閒方式。因此美國商人總是寄望每年的銷售業績能够超越前期的紀錄，同時每一項收入報告均能顯示較前更優厚的股息與盈餘，舊的經濟紀錄因而每年均被打破。隨著人口的增加，平均生活水準不斷的提高。從嬰兒用的潤滑油到棺木等各種東西的製造人繼續不斷的投資於新機器、建造新工廠，並進一步的研究發展，刺激需要和生產。這種投擲在未來市場的賭注即為經濟成長強有力的原動力。經濟成長為目前各國政府官員、商人及一般國民視為優先考慮，並為總體需要及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西元1960年代和煦的經濟景象使美國對內每年國民總生產之增加達到70億美元，1966年國民總生產甚至打破了7,000億美元之大關。近年在令人鼓舞的氣氛下，總統和國會以各種減免稅之抉擇，對州與市之補貼以及擴大社會服務自娛。當然，經濟的天堂境界尚

未能達到，而國內需要也尚未減縮為零，甚至在最繁榮的美國還有400萬窮人，某些都市的貧民窟更可與加拉卡（委內瑞拉首都）及加爾各達貧民窟相匹敵。雖說失業僅危及20或25個工人中之一人，但它對城裡的黑人區及窮鄉僻壤區的影響是非常慘酷的。這種現象使我們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去正視我們的教育系統，對失業的救濟安排以及我們工作的真正意義。水源的污染，堆滿破爛汽車的場所以及高速公路兩旁的廣告標示牌等已足以構成「美麗的美國」實質上最嚴重的限制條件。

以上諸問題並非問題的全部，但要點是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從一個富有社會的這些持久的缺點中即可看出目前「經濟需要」新定義與舊定義的不同。目前繁榮與破產的悲慘循環已經克制了，許多美國人已有在社會各處散佈繁榮與愉快的意願及辦法，對公共政策的反對意見也有了新的轉變。

美國人實際上是否會利用他們的富足去使社會貧窮減少？並將其原始而粗略的物質文明轉變為一種真正的文明？這兩點可能為這一個時代主要的使命。然而值得以美國的名譽來斷言，這種使命最主要的是有關於克制經濟循環所產生的殘暴，以及觀察全國自然與都市環境的新機會。

以上可謂基於重大成就而獲致的遠大進步。但到底先進國家的國民經不景氣的停滯及不幸之後，得到何種的解救與補償呢？美國行政上的財政計畫中曾經改變的是公共政策。新舊經濟政策的不同在於以聯邦預算為出發點的國家信心條款，以及以課稅和財政支出為行政管理工具的現代分析方法間的差異。不久前當總統向國會提出一項公開顯示赤字的一月預算時，必遭傳統商業及財政心理的嚴重指摘。當時僅少數非正統派的經濟學者支持這種嚴重侮辱「財政道德」的行為。通常當總統提出不平衡財政預算時都會頒佈各種保證來為他自己辯護，諸如向政府做經濟奉獻，平衡聯邦預算的個人信念，以及保證盡速平衡國家帳戶等。

相反的，今天一個高階層的執行者甚至在經濟持續繁榮時，都可很大膽的向他的選民保證減輕稅負因而加重眼前的赤字。此外他並期望經濟專家們、警覺的政客、以及通曉世故的商人贊助他的主張。雖然這些都是最近的歷史，但是這種解決聯邦財政困難新方法的功效，早已由西元1966年那一段持續不斷的經濟發展太平時代予以證實了。

雖然個人的節儉能確實與清教徒的道德相符，但個人的節儉與浪費並不是國家道德的表現，只能表示維持或增加一般財富的企圖。所以一個國家若長久以來就把公共財政當做個人財政的延伸，則將無法達到新的局面。

對於不聰明的國家這種觀念特別難以改變，他們不但需要教育上的經驗，也需要理論上有系統的說明。過去40年之中大多數美國人曾經歷過三個主要的教育經驗，其一為大不景氣帶來的經濟恐慌；其二為新政（New Deal）帶來的新希望；最後一個經驗是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支出龐大軍事費用而帶來普遍的繁榮。所有這些經驗不論多麼可以作為借鏡，都不是適當的「教師」。它們本身只能使人們對現有情況及其延續產生不滿。僅僅怨恨大不景氣的不幸以及西元1931年胡佛總統不當的政策是不够的，還需要一整套能建議實施各種政策的理由，就像凱因斯一向所相信的，只能對真正的辦法討論其好與壞。

1960年代的「新經濟學」是一種觀念上的勝利，這種觀念是由約翰梅奈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即提頓男爵的天才產物。本書的目的即在描寫這個構設思想的人，他的教育、事業、老師、朋友及知交（劍橋的摩爾、福斯德、斯特梅奇；布倫斯貝律的霍華夫、貝爾以及格蘭特；皇家學院經濟系的馬夏爾與畢固）、他的哲學世界、著作、以及他在高階層財政與公共行政方面的報告等。

這本書同時也是一顆心靈的傳記，試圖描寫一個具創造才智的

學生將傳統經濟學轉變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異教徒思想的事實與影響。直到1930年代為止凱恩斯在劍橋所學與所教的經濟學是人人所信仰的。以大學的威望而言，只要劍橋的經濟學者認為是好的，那麼至少沒有一個英語系世界中的經濟學者敢于以否認。凱恩斯的巨大著，即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中所宣講的經濟學使得劍橋的意見分裂，觸犯了老師及同僚，並引起了至少有50年的經濟學者之間觀念上的爭端。凱恩斯對其同時代的人最大的吸引力是他能在一生中的不同時期提出根本對立的思想與見解。大多數的理論家認為在他們事業生涯中若能把握他們所研究的一種觀念就已經是够幸運的了。然而對凱恩斯而言，「一」是個很小的數目，他的心志強、有彈性而且富創造性，這在別人是難有的。

此外凱恩斯不像一般抽象思想家一樣的活在象牙塔裡。當他寫經濟學時，他一直希望能改變他的同僚，甚至希望能影響一般受過教育者的見解。更重要的是他渴望能使政府官員們由錯誤的政策改變為明朗化的行動。因此他不但激怒了頑固分子，而且為了改變他的同儕耗費了令人惋惜的大量時間。然而在他一生中，他比多數同樣致力於使其聽者或讀者信服其聰慧意志者得到更大的成功。

1946年凱恩斯因心臟病逝世。他的心臟病在二次大戰期間因過度辛勤的致力於財政部工作，以及1945年冬天負責達成向美國貸款，簽定糾纏不清的協議而更加重。在他逝世後的20年中，美國、英國及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仍然瀰漫着凱恩斯理論的尾聲，這個尾聲同樣的也是這個傑出的英國人生命及影響力的一部份。

目前我們都可說是凱恩斯經濟學的擁護者，當一種新的思想演變成一般人、內行人或外行人所接受的思想時，可說是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凱恩斯自己是個無休止的、負責任的知識份子。他校準他的理論使之合於變化中的世界，因此可見他並不是一個不懂實際生活的哲學家。若凱恩斯能活到1960年代，他必會忙於研究更新更好的凱恩斯理論來引導消滅貧窮及所得不平均分配的現象，並改進美

國人及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水準。

一般理論並非凱恩斯的定論，但世人不可遺忘他對他的同胞及世人所做的努力。以下各章節將詳述該時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的生活、思想及當時各國的局勢。

# 凱恩斯時代 目 錄

序 言.....	(1)
<b>第一部 凱恩斯與凱恩斯經濟學 .....</b>	<b>(1)</b>
第一章 教育及早期經歷.....	(1)
第二章 凡爾賽和約及其後.....	(15)
第三章 到一般理論之路.....	(37)
第四章 一般理論.....	(53)
第五章 新 政.....	(77)
第六章 戰爭的考驗.....	(101)
第七章 凱恩斯在戰後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125)
<b>第二部 屬於凱恩斯的時代 .....</b>	<b>(145)</b>
第八章 成長與成長精神.....	(145)
第九章 自動化——過去的或現代的.....	(161)
第十章 古典通貨膨脹與現代通貨膨脹.....	(177)
第十一章 概念上的勝利.....	(193)
結 語.....	(221)
作者簡介.....	(223)
資料來源.....	(225)

# 第一部 凱恩斯與凱恩斯經濟學

## 第一章 教育及早期經歷

西元1880年代可說是英國經濟史的分水嶺。在那十年，不列顛的經濟終於擠身為世界貿易大國。因廉價的紡織品以及輕金屬產品長期居世界領導地位，所以英國對外貿易每年能有巨額的出超；而國際收支平衡不僅使整個國家有能力向其他國家購買足夠的糧食及工業原料以供給全國勞工及工廠，還造成國內外投資的大量利潤與盈餘。到西元1946年穀物法撤銷為止，英國政府總算確認了自由貿易與管制貿易的效果。而且自1850年以來，英國更因自由貿易的關係，得以在全世界最便宜的市場購買糧食。英國農民難免有所怨言，但也於事無補。由於自由貿易是在完善的經濟理由之下產生，而且由享受大量自由貿易商業利益的聯合王國所支持，所以保護政策對於進出口貿易並重的英國而言，存在的機會非常小。十九世紀後期在自由貿易理論影響之下的歐洲國家中，英國這個例子算是最突出的。

大英國協的繁榮可能為世人所羨慕，但其繁榮的分佈卻極端的不平均，大部份財富集中於少數人，而另一方面工資卻非常的低廉。英國政府的策略適宜實際的資本累積，但對於勞工階級的生活水準則僅有小小的助益。凱因斯對於1870年至1914年的英國給予下列評語：

「當大多數人民每日生活情況不斷改進時，消費量最少的階級卻能很順利的掌握整個社會所增加的所得收入…。這種不尋常情況的發展有賴虛張聲勢的手段。勞工階級方面由於無知或無權而接受了事實；或因習俗、方便、權勢而被唆使或哄騙；而且由於已建立的社會制度使他們認定只有他們和大自然及資

本家充分合作才能够生產。資本階級方面則很自然的被允許吸食甘泉，雖然在心照不宣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量很小，但實際上他們等於是可自由消費的階級。」<sup>①</sup>

換言之，所謂「社會均衡」為相對較弱的工會組織與或多或少的長期勞動力過剩，以及積極、自信的雇主們互相結合的產物，其工資低而利潤高。資本家階級的特色是他們甚至能使中下等的勞工們容忍這種情形。英國資本家一向是節儉而且勤勉的，他們的儲蓄習慣使他們能够應付再投資所需的巨款及增加生產力，並且在長期至少還擴展了消費財的流通。按照凱恩斯的判斷，社會情況平靜促使上述情況形成為自然制度的先決條件。

無疑的，這種社會一定會產生很多社會改革者，而且在適當的時候窮人的生活會得到改善。但對於社會改進可能性的認識是與那些保證社會繁榮的制度，如自由貿易、國際金本位制及國內自由放任政策等完全一致的。它們對社會的繁榮曾有所幫助，而且在將來會更有助益。英國這種社會精神境界比二十世紀美國的自負更為實際。

直到西元1883年約翰梅奈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誕生那年，英國經濟統治上的新意外挑戰已經非常明顯。在拉丁美洲、亞洲、南非聯邦及澳洲等地，紡織產品、金屬產品以及新產品如打字機、罐頭食品、小型工具、縫紉機以及整桶的蘋果等已經有歐洲的德國及北美的美國與之競爭。歷史學家曾表示有一段時期，即1890年以前「德國製品」之標籤及美國百萬富豪的照片都成為英國人最憤恨的對象<sup>②</sup>。違反了一貫對英國領導地位所表現的適當尊重，德國及美國商人展示一種令人作嘔且侵略性的競爭力。他們採用廣告，運用技巧與無情，使得自滿的英國對手無法與之競爭。英國經濟學家福克斯威爾（H. S. Foxwell）曾回憶「我很驕傲的記得從小便被教導永不購買廣告的產品」<sup>③</sup>。西元1917年，福克斯威爾表示「我們大多數同胞從來不用廣告（如果有也是極少數）」<sup>④</sup>

。所謂「極少數」可能是代表那些對當代精神讓步的苦修道德家。如此可見各國對英國領導地位的挑戰已經獲得成功。到西元1914年為止，美國產品大量的超出英國產品，德國產品則超出較少，這些產品包括煤、鐵、鋼及大部份工業產品。在光學儀器、製藥及化學方面德國人有居領導之勢，美國人則在汽車及電氣用品方面有同等重要的優勢，特別令英國人不安的是英國始終沒能把握住他們所擁有的新技術產品。

對於英國中產階級而言，總體的繁榮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為止。雖然英國在世界市場所佔比率可能已縮減，但出口的絕對價值仍繼續增加。而且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許多亨達家庭仍享用著已往投資的股息與利息。私人所得、在學兒童津貼以及維多利亞時代顯要家族後代的安逸生活均有賴已往順利的商業投機來維持，以下便是一個著名的實例。

在福斯德手著其姑母瑪麗安桑頓(Marianne Thornton)的傳記中曾記載當她1887年逝世時遺贈給福斯德8,000英鎊。這8,000英鎊的利息指定用來做為受遺贈者的教育費用，至於本金則在他25歲時方能完全獲得。福斯德很感激的摘記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這位顯要所贈與的遺產使他一生能有重大的改變。他記載道：「感激這筆遺產使我在申請獎學金失敗之下還能在劍橋攻讀。大學畢業後又藉這筆遺產得以旅遊幾年。旅遊則使我傾心於寫作。當我第一次旅遊印度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8,000英鎊的價值開始低貶，到最後幾年幾乎成為沒有價值。但在那之前我的著作已開始出售，並已可以依靠寫作為生了。在我們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種作法是否有礙名譽我不得而知，但至目前為止，我非常感激這筆遺贈，非常感激瑪麗安桑頓，除了他以外沒有人能使我成為作家，他的這種愛心將伴隨我直到永遠。」<sup>⑤</sup>

瑪麗安桑頓的錢是由他的父親亨利桑頓(Henry Thornton)而來。亨利桑頓是國會議員，銀行家，又是著名的「大不列顛票據信用(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一文的作者，於1815年逝世。生前兩項重要著作「霍華德的末日」(Howard's End)以及「通往印度的走廊」(A Passage to India)使得他的遺產大大

的增加。

約翰·梅奈·凱恩斯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繁榮社會。凱恩斯家座落在劍橋哈威路 6 號，曾被形容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哥德式建築物，仍然保留其父母時代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的餘風<sup>⑥</sup>。老凱恩斯家的三個小孩各有其不同的事業。傑弗萊 (Geoffrey) 為內科醫生以及威廉布雷克 (William Blake) 的主編人。瑪格麗特 (Margaret) 為社會工作先驅者。老凱恩斯夫婦也並不比他們的子女遜色。約翰·尼維·凱恩斯 (John Neville Keynes) 從他的父親約翰凱恩斯繼承了一筆小小的資產後攻讀劍橋，並贏得數學獎學金。最初他是一個學者兼家庭老師，後來便專心當行政官。他的一生就像他在劍橋時一樣順利與快樂。他的著作「政治經濟的範圍與方法」(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可說是當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範本。西元 1910 年至 1925 年身為大學註冊主任實際上卻是劍橋最主要的行政官。他最著名的兒子曾這樣形容這個行政官父親：

「35 年來他是行政官中最好的一個，而且以我的判斷在這些年來劍橋是創校以來較好的階段。大學的紀律和原則都非常完整而毫無賣弄學問或官腔花樣的情事。任何設施都是為了大學教育本身而設，不像目前大學的走樣。這種情況不但對於建立良好環境，促使學生們的學習、科學實驗和教育都能够在無限制與無阻礙之下進行，並且使學習、科學實驗及教育維持在最高的水準。這在目前似乎是沒有人能辦到的」。<sup>⑦</sup>

他們父子之間的信件往來充分表現日常生活的親密關係。家庭中各份子的閱讀書刊，假期的利用以及雙親的興趣均各有千秋。

西元 1882 年老約翰梅奈凱恩斯與弗蘿倫絲布朗 (Florence Brown) 小姐結為夫婦。弗蘿倫絲布朗小姐之生活與情感深受劍橋的影響。她的父親神學博士約翰布朗牧師 (Reverend John Brown, D. D.) 是個有先見之明的人，讓他的女兒進入紐漢學院 (Newnham College) 攻讀，並使之成為劍橋最早期的女性畢業生之一。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凱恩斯夫人曾當選劍橋市長。她首先倡導協助社會不幸者的各種計畫；諸如童工交換計畫，社會養老金計畫、勞工家庭之經常性協助計畫，以及結核病治療之改善計畫等。由於一般人非常貧困無法協助遺留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無數社會意外事件的餘傷，所以她的工作在當時是既困難而又迫切的。工業社會急需社會服務制度，但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這種社會服務制度的建立比起俾斯麥的德國要落後一大截。

凱恩斯在哈威路 6 號所過的生活是「環境中等但舒適穩定，由一批當地的僕人侍奉得極好」<sup>⑧</sup>。對於一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書香門第來說「舒適穩定」是遠超於一般人在國內所享受的豐足。所謂「舒適穩定」包括歐遊、劇場、戲院、金石書畫，當然還包括了小孩們就學的最好學校及大學。在某些方面來說這是生活的一種，在今天來說卻只有某一階層的人才能享有這樣的生活。

因此年青的梅奈在劍橋註冊入學以前就能進入伊通（Eton）就學。在伊通我們很可為那些雖家世顯赫，但在校生活卻極為悲慘的英國人編一長串名單。以喬治歐文（George Orwell）來說，他在伊通的痛苦日子是最常見的一種情形。這種學校裡的痛苦經驗是英國小說及回憶錄的週期性論題之一。然而對凱恩斯而言絕非如此，在伊通的那段日子，他是快樂、成功及有成就的。凱恩斯早期學校生活的勝利可以說是他後來有成的先兆。在當時英國公立學校中，一個學生能在所有同學中獲得恩寵的多半是傑出的運動員，而不常是天才學生，偶而小政治家也能贏得恩寵，但仍屬那些能迎合年青人口胃者為多。凱恩斯雖然參加學校中的多種運動而且在水上運動方面有很熱心的表現，但他並不是一個傑出的運動員，對於他的板球技能，他自認「如果課程中包含板球遊戲理論及歷史，我一定可以應付得很好」。<sup>⑨</sup>

使得凱恩斯在伊通贏得盛名的特質是他的悟力、經理能力以及個人的尊嚴，並非他的臂力與肌肉的協調。做為一個學者，他對所

有事情的應付既容易又完美。他的家庭老師對他的評語是「他對任何事情皆有產生興趣的能力，而且處理任何事情絕不草草了事」<sup>⑩</sup>。當然這不僅是凱恩斯以十五、六歲年紀在同一學校贏得數學獎時的表現，而且他在古典文學的高水準表現，以及他數度呈交伊通文學社團的無數報告及短文也充分的表現了這種精神。他的所有報告與短文均為這位巨匠帶來無比的利益，例如「克拉寧的伯納」(Bernard of Cluny)、「史托德的特性」(the character of Stuarts)、「東方與西方之差異」(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等文。凡是教過他古典文學的都預言他將來在古典文學方面必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數學老師對他的數學方面的前途也同樣的具有信心。他自己則表現得幾乎對任何一項學科都有同等的愛好，而且在伊通時就已開始搜集研究各種名著。

伊通和其他公立學校所不同的地方是對於心靈方面的成就極為重視。凱恩斯所以能贏得同學們的尊敬主要是因為他在智力方面有卓越的基礎，實際上是他天生具有適合各種場合的領導能力。他好像生來就被認為能掌理大學部社團，而且他本身及言談間所具的魔力使他能成功，並且深受歡迎，因此他很輕易的贏得同學們認可的伊通學府最高榮譽——當選為 Pop，即伊通代聯會的學生社團負責人。事實證明不平凡的原始思想及有效的行動是當時凱恩斯與伊通少年間最大不同的地方。

凱恩斯在伊通的後期猶豫於應選擇劍橋的兩個最大、最突出的學院——皇家 (King's) 亦或牛津 (Trinity)。最後他選擇了皇家學院。西元1902年當他十九歲時以數學學者進入皇家學院，但是他 在其他方面的興趣仍然使他非常活躍。伊通與皇家學院在歷史上有很長久的關係，而且他在伊通求學時所建立的聲名使他在大學裡仍居顯要地位。他的傳記作家之一曾觀察他「很快的在皇家建立了他當年在伊通優於同儕的權勢」<sup>⑪</sup>。在大學社團聯合會這個曾經授予許多英國政治領袖第一課的組織裡，凱恩斯很光榮的成為論戰演

講者，而且成為社團在這個「課程」方面的主席。成年的凱恩斯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無黨無派的，無論是自由黨或工黨，他都無法理解他們的充分價值而保證他的支持與贊助，當他還是劍橋學生時，對於他所認為違背心智的政黨都曾加以溫和的反駁。

實際上凱恩斯不但是學者而且是反叛者。他的興趣很快的使他更政治化，而不似以前的數學化。他的一個後期同學，也是他的崇拜者認為他很幸運，因為「在劍橋確立的標準之下他並沒有被拘限在最好的班級裡，雖則只有在最好的班級裡才能有在純數學理論中成就名聲的希望」<sup>12</sup>。劍橋的標準在當時與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所定的標準相去不遠。1904年凱恩斯的一篇短文「艾德蒙巴克的政治學說」(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Edmund Burke)贏得了獎，從此他在職業上的興趣漸漸轉向政府機構。英國政府機構自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改為競爭考試選舉以後，就成了大部份英國大學畢業生最有前途的事業。英國政府行政管理階層在實質上與美國政府機構不同，它公開提供權力、公職以及豐富的待遇。因此非常自然的，像凱恩斯這種天才和他本身的背景一定會考慮投身於政府機構，而不是學術界。

對於凱恩斯來說政府服務是特別叫他心動的，因為在他畢業時他還不十分確定要成為一個經濟學家。在劍橋時他很遲才埋首於經濟學，但很快的他就被他的老師亞佛烈馬夏爾(Alfred Marshall)及畢固(A. C. Pigou)(馬夏爾與畢固先後擔任大學經濟學教授)認為深具才能。馬夏爾為此還致信老凱恩斯表示「令郎在經濟學方面的表現突出，我曾告訴令郎，如果他將來決定投身於職業經濟學家行業我將欣喜萬分，當然我不能也不會勉強他的」<sup>13</sup>。然而也許就是因為馬夏爾這封信，老凱恩斯懷疑「我恐怕馬夏爾會極力的游說他為經濟學而放棄一切」。<sup>14</sup>

當然實際上這是不致於的，因為劍橋給予學生的是多方面的。凱恩斯的朋友、至友以及他自己除了政治經濟以外均有多方面的興

趣。凱恩斯樓上房間住的一個朋友曾這樣形容他：

「他爲人寬大、包容，有時又極爲幽默與惡作劇，有時夜晚很遲買了東西一路說風涼話匆匆趕回來，一大早五點鐘便又急急忙忙的趕去牛津大學上哲學課。他本人有如加斯李 (Gaselee) 一樣成熟，他的橋牌打得幾乎與史賓斯 (Spens) 一樣好。總之，他幾乎可以做任何事，而且都做得非常好。如果他在皇家學院無法找到他所要的答案，他便把目標轉到牛津大學及李頓斯特雷奇 (Lytton Strachey) 團體。若是牛津大學也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則對他來說還有整個世界呢」。<sup>15</sup>

李頓斯特雷奇組織是對凱恩斯一生中重要部份的端倪。早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凡妮莎 (Vanessa) 與維琴尼亞史蒂芬 (Virginia Stephen) 就發起了布倫貝律團體的組織 (Bloomsbury group)。凡妮莎及維琴尼亞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印度教學者，也是不可知論者。在凱恩斯就讀劍橋時她們也在李頓斯特雷奇組織及他的劍橋圈之中。這個組織最先是以斯特雷奇爲中心，後來則以斯特雷奇及凱恩斯爲中心。這個組織的會員是一羣在劍橋歷史上具秘密性的排外組織，簡稱爲「社會」 (Society)。西元1908年當凡妮莎 (後稱凡妮莎貝爾) 及維琴尼亞 (後稱維琴尼亞渥夫) 兩人由於其父逝世無法繼續支持時，由哈羅德 (Harrod) 開始指派職員掌理布倫斯貝律團體的倫敦獨立生活。凱恩斯實際上是在倫敦的布倫斯貝律團體未有歷史前就已牽涉在其中了，因爲他在劍橋時就遇到了該團體最活躍的三個會員，李諾渥夫、李頓斯特雷奇與克利夫貝爾 (Clive Bell) [註1]，以及熱心又難捉摸的參加者佛斯德 (E. M. Forster)。

這些天才們的興趣與才能完全相異，他們是由他們之間共同的特性而聯合起來的。每個人都是頂絕的聰明，能言、善辯、熱誠而且都懂得學理。他們的學理在1902年也就是凱恩斯在劍橋的第一年結束時正式宣佈出版，這本書是哲學家摩爾 (G. E. Moore) 的倫理學原理 (Principia Ethica)。根據凱恩斯的說法，摩爾的影響